

故事里的沂蒙

生死与共——浴血渊子崖

渊子崖坐落在沐河东岸，是临沂市莒南县板泉镇的一个村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隶属于中共山东滨海区抗日根据地沐水县板泉区。这个村庄西临沐河敌占区，东则是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区域，处于敌我交错的拉锯地带。

1940年1月，八路军一部来到板泉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0月，抗大一分校民运工作团二队二十余人进驻渊子崖及其附近村庄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渊子崖村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村政权，农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还建立了抗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从此，渊子崖村民在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下，把过去打土匪用的生铁牛、五子炮、大刀、长矛、土枪等集中起来作为武器，同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盘踞在沐河西岸的日伪军对渊子崖村恨之入骨，一直盘算着早日拔掉这颗钉子。1941年12月中旬，在沐河西岸小梁家据点活动的伪军，给渊子崖村送来一张条子，要村里上交鸡、肉、酒、白面等食品，还要大洋1000块。村里收到条子后，毫不客气地给伪军写了回条：“酒、肉、鸡、面、钱都准备好了，有本事就来拿吧！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伪军队长梁化轩接到回条后恼羞成怒，于12月18日带领150名伪军包围了渊子崖村。面对伪军的进犯，全村男女老少众志成城，用土枪、土炮将来犯之敌打得抱头鼠窜、大败而逃。

败逃后的伪军并未就此罢休。12月20日凌晨，梁化轩带领日军骑兵、步兵一千余人，携带四门大炮，对渊子崖村施行报复。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渊子崖村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同仇敌忾，以土枪、土炮、大刀、长矛、锄头、菜刀、木棍等为武器，在村长林凡义的带领下，以围墙为依托，与敌人展开搏斗，连续打退敌方的六次冲锋。激战至午后，敌人集中炮火，将围墙、炮楼轰倒，大批日伪军攻进村内。

自卫队员和乡亲们与敌人展开了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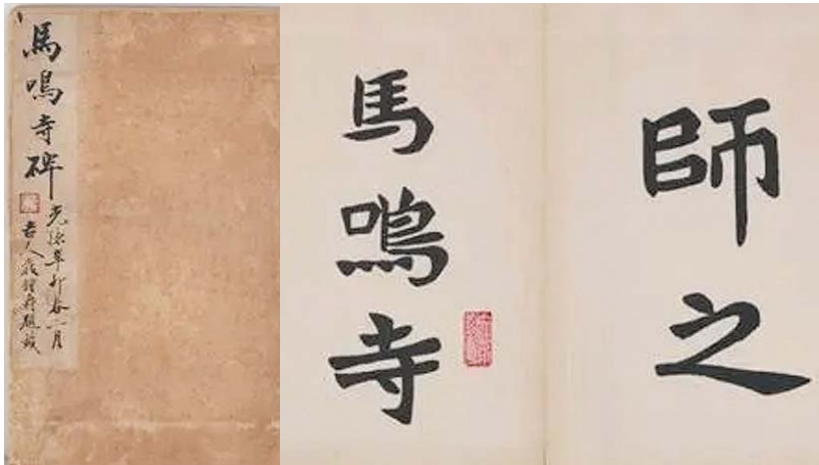
肉搏，村民的喊杀声和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战斗中，村自卫队队员林九臣英勇牺牲，他的妻子手拿一把菜刀，仍奋力与敌人搏斗，在砍死一名日军后被敌人刺死。

穷凶极恶的敌人把俘获的林庆会、林崇洲用绳子捆绑起来，扔进熊熊燃烧着的草垛中活活烧死。两位烈士牺牲前，在身体剧痛的挣扎中还不不断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年逾花甲的林九星老人被敌人抓住，被刺刀穿十几下，又被扔进粪坑。敌人撤出村子后，林九星老人被村民从尸体堆里救出来，他躺在村长林凡义怀里，气若游丝地从嘴角挤出了最后一句话：“咱没给渊子崖村丢脸！”

渊子崖村民与敌人激战之时，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五团的一个连和沐水县、区一部分武装闻讯后飞兵救援，傍晚时分抵达村庄外，随即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面对内外夹击，敌人难以招架，最后不得不撤出村子。增援战斗中，板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和四十多名八路军战士、县区中队战士壮烈牺牲，渊子崖村民以原始的、简陋的武器同装备精良的千余日伪军血战一整天，打死日军官兵一百余人，自卫团员和群众147人在搏斗中壮烈牺牲。

渊子崖村自卫战的英勇事迹传开后，1942年，滨海专署授予渊子崖村“抗日楷模村”光荣称号。1944年，滨海专署为了纪念在渊子崖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在村北小岭上，用紫红色的巨石建成了一座六角七级的纪念塔。塔的背面镌刻着烈士的英名，塔的两侧是滨海主要领导人和沐水县参议会的题词。参议会的题词是：云山苍苍，沐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

青山无言，英灵长眠。如今，作为当年那场战斗历史见证的渊子崖抗日烈士纪念塔，仍旧巍然耸立在渊子崖村北的苍松翠柏中，它不仅铭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誓死抗战的决心，也记载着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渊子崖保卫战的故事也将一直流传下去，激励后人不断奋进。



梁启超临“马鸣寺碑”。

□周惠斌

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学贯中西、囊括古今，有“近代书法美学第一人”之誉。

梁启超晚年推崇北魏书体，取汉隶、唐楷和行书笔意，融入方劲的魏碑体势，形成沉雄浑厚、平实隽美的“题跋体”书格，凸显出他立身处世中耿直、儒雅的个性和气度。

梁启超与“马鸣寺碑”渊源颇深，他幼年时曾临习其帖，中年收藏拓片，晚年为其题跋，一生与“马鸣寺碑”结下了难舍难离的情愫和缘分。

马鸣寺位于今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后屯村西北，始建于北魏太平真君二年，初名大樊寺、天王寺，是南北朝时期北方颇有名气的寺院。鼎盛时期规模非常宏大，香火旺盛，远近闻名，仅豢养的马匹就达百余匹，马鸣之声闻于数十里外，故改名“马鸣寺”，后逐渐衰落。

清道光年间，马鸣寺毁于火，原立于寺中的“马鸣寺碑”被埋于废墟。此后，该碑在乐安县(广饶县旧称)大王桥庄被发现，邑人宋世滋曾拓印收藏。同治十年，时任乐安知县的赵国华，谕令乡民将该碑移至县治书院保存。但当地乡民私下隐藏石碑时，为外乡人盗走，追回中不慎从马车上跌落，断为三块。光绪二十年，知县曾启坝访知“马鸣寺碑”在大王桥庄一李姓村民家中，于是强令其交出，移置原处。

清代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乐安籍举人宋其端将其叔祖宋世滋所藏“马鸣寺碑”拓片手装成册，并题跋：“……此拓予于十余岁时得之叔祖世滋公者，藏之篋中五十年，今始手装成册。陵谷变迁，依然故物，披览之余，感慨系之矣。”宋其端(1845年—1915年)，字伯庄、墨庄，乐安县杨庄村人，光绪二年丙子科山东乡试第十七名举人，曾任山东博平县训导，以书法著称，曾书《船亭记》《重修山东新清河碑记》等，流传颇广。

民国初期，有人欲高价收购“马鸣寺碑”，后屯村村民恐再生变故，便又藏匿该碑。1933年，大王镇王西学校将该碑运至学校，供学生临摹。1938年8月，为避免日军劫掠，当地武工队将该碑掩埋于废墟中，后存放于后屯村公所。1951年，后屯村修建完全小学，村民将石碑垒砌于屋山墙上。1981年，“马鸣寺碑”被送往广饶县文物部门，1984年，“马鸣寺碑”由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

“马鸣寺碑”全称“马鸣寺根法师碑”，系北魏孝明帝于正光四年为纪念去世的根法师(468年—523年)而立，全碑通高167厘米、宽87厘米、厚21厘米。圭首凸形，高31厘米、宽30厘米，顶端为竖排单行阴刻“马鸣寺”三字，下方为竖排四行阳刻“魏故根法师之□□”八字，每行两字，皆魏体楷书。碑文为阴刻魏体真书，直排22行、满行30字，字直径3厘米许，共计639字，前序后铭，主要记述根法师“爱自

弱年，英年早集”“禅念求道，终生莫辍”“授讲后生，四方慕义，云会如至”“造经数千，布满缙素，刊建圣颜，抽珍裁飭”等生平事迹和功德，无撰书者姓名。

“马鸣寺碑”是传世魏碑中保存较好的珍贵石刻，书用“侧笔”，极尽变化，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笔法饱满、苍劲有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历代书家、学者所推崇。

清代金石学家陆增祥赞其为“北方魏碑的杰出代表”，清代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在《激素飞青阁平碑记》中说：“魏碑多隶体，而亦多寒瘦气，求其神韵之佳者极少，此独跌宕风流，尚在《萧娴碑》上。”康有为也曾在《广艺舟双楫》中前后八处提及“马鸣寺碑”，视其为“能品”，指出“‘马鸣寺碑’侧笔取姿，已开苏(指苏东坡)派，‘在、汶、北’等字，与坡老无异”，“唐人寡学之，惟东坡独肖其体态，真其苗裔也”，赞叹它“若野竹过雨，轻燕侧风”。

梁启超自幼练习馆阁体，后以习碑为日课，先后临习“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高贞碑”“李超墓志”“马鸣寺碑”等，他曾自言临习“马鸣寺碑”是幼年时的必修功课，他曾苦下功夫，孜孜临摹，一笔一画皆忠于原帖，纸洁墨浓、神气凝重，即便半边残字，也照临不苟。

《梁启超与饮冰室》(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中辑有张树基撰写的《梁启超临〈马鸣寺碑〉册》，文中披露天津一位徐姓收藏家藏有一册梁启超早年临写的《马鸣寺碑》“经折式课册”，计98页，首四页为大字书“魏故根法师之马鸣寺”，正文字径约4至4.5厘米不等。封面行书题“马鸣寺碑”四字，光绪十七年由严仲爵题签，清代宣统二年经西村题跋并珍藏，后为清末翰林、书法家潘龄皋铃印收藏，最终转赠同好徐氏。

2023年11月23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新民：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展》第四部分“余事：先辈遗墨，书艺复兴”中，展出了这件梁启超年幼时临摹的“马鸣寺碑”(38.5×18.5厘米)。

梁启超后来广泛集藏历代金石拓片，潜心校勘整理、考据研习。1923年、1925年，他曾先后在收藏的“马鸣寺碑”(碑身断裂之前所拓，呈“凸”字形)拓片上，题跋“极峭紧而极排纂，两者相反而能兼之，得未曾有也。小欧学之，有其峭紧而无其排纂。癸亥小除夕，启超半醉记”，“支道林爱蓄马，或问之，曰‘吾赏其神俊’。吾生平酷嗜根法师碑，亦以此。乙丑元宵，启超再跋。”(《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218页)，这反映出梁启超对《马鸣寺碑》的钟情和喜爱。

梁启超病逝后，其家人将“马鸣寺碑”拓片，连同其他1200余件历代碑帖拓片，悉数捐赠给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史海钩沉】

梁启超与东营『马鸣寺碑』